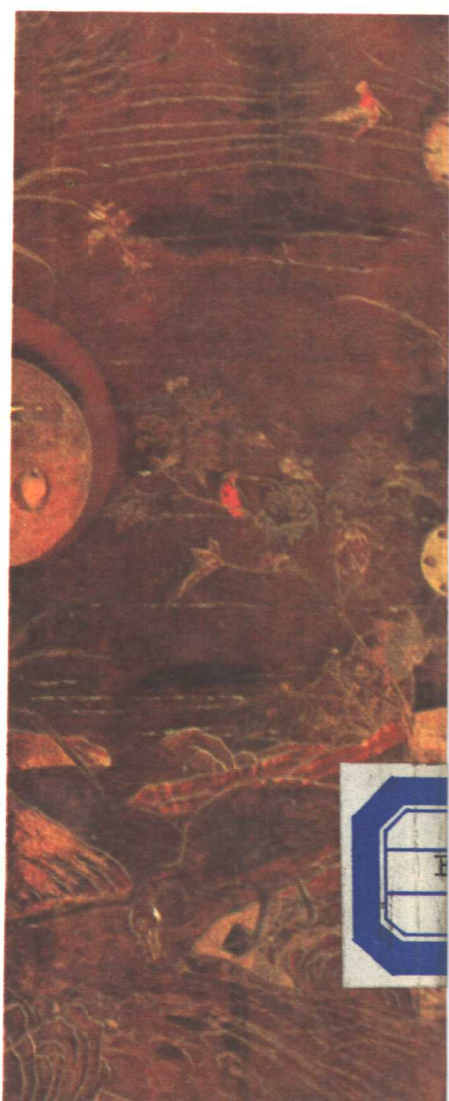


中國民主之困局與發展

● 時報書系 523

金耀基／著



中國民主之 困局與發展

金耀基●著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時 報 書 系 ⑥23

中國民主之困局與發展

作 者 金耀基

發行人 儲京之

出版者 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地 址 臺北市大理街一三二號

電 話 三〇六六八四二

郵政劃撥 一〇三八五四

校 對 周淑貞

印刷者 文祥印刷有限公司

地 址 臺北市萬大路七一巷二二號

初 版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五月三十日

登記證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〇三四號

定價新臺幣一〇〇元

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調換

前言

• 1 • 前言

這本書是我這幾年所寫一部份文字的論集。自一九六六年出版「從傳統到現代」之後，中國現代化仍然是我關心和用心的大題目。十餘年來，身居香港，看到大陸和臺灣兩地之種種現象，使我深深感到在中國現代化的全面運動中，政治現代化實佔據一樞紐性的位置。而政治現代化中最令人念茲在茲、憂喜參半者則是民主化的問題。以是，不容於己的，常就觀察、研究和反省所及，陸續就臺灣和大陸的這些問題寫了不少文字。我相信民主是中國政治發展之常道與正道，但我對民主決沒有輕漫的幻想，事實上，我越來越覺得民主之建構可能是中國現代化中最艱鉅的工程，它也將是對中國人的政治智慧最嚴竣的考驗。

生於五四之後的我輩，應該珍貴民主的理念，但我們對民主決不能只停留在感性的認同

的層次。感性的認同，不論是多麼熱情和真摯，對於中國民主的建構都不會有太多的貢獻。民主之建構所最需要的是理性的思維和理性的行動。這裏收集的一系列文字，因為於不同的時間，且常是對某些特殊事件或現象有感而發者，故缺少系統性、一貫性，且不無重複駁雜之感。但基本上，這些文字都是環繞着一個範圍，即中國政治的現代化，而着墨最多的則在分析中國民主遭遇的難境和發展的契機。所以，我用「中國民主之困局與發展」為這個論集的書名，我在「代序」的長文中且提出了一個綜合的基線的討論。無疑的，對於民主這樣複雜的問題，所見所思自不免疏漏不周，但每篇文字我確是盡了心力，絲毫不敢掉以輕心的。假如如此書對中國民主大工程之建構能有一磚一石之貢獻；則無數個長夜的燈下苦思也就不算枉費了。

本書之得以出版，應該感謝高信疆先生和柯元馨女士，沒有他們二位的好意和鼓催，此書恐不會與讀者見面。現今移居加拿大的陳煥賢女士對於本書絕大部份的篇章，從資料的收集，到原稿的謄寫，以至最後的校勘，都曾給予了我最好的幫助，我要借這個機會，向她致最誠摯的謝意。

一九八四年四月於香港

中國民主之困局與發展（代序）

一、從民本到民主

（一）現代化與民主化

論中國的現代化，必不能不特別注意中國政治的現代化。誠然，政治現代化只是整個現代化的一個面向，但卻是一個極重要的面向，而對中國來說，政治現代化也許是整個現代化的樞機。不錯，經濟現代化是現代化的基礎，如工業化不成功，經濟無法起飛，則整個現代化的工作都將黏貼在地上，難有起色。在臺灣的中華民國的現代化之強勁活力，幾可歸因於其生猛的經濟現代化，而今天政治上的種種變遷與問題，與經濟現代化皆有直接間接的關

係。但是，政治畢竟非經濟的附屬品，也非其上層建築這樣簡單。政治有其獨立性、自主性，它與經濟之間的互動關係，千絲萬縷，最堪注意。臺灣之經濟的巨大發展，亦未嘗不是由於政治之推動。過去三十年，臺灣由農業經濟轉向工業經濟，自始迄今，政府一直扮演了積極的不可或缺的角色。即使今日經濟向高科技工業轉變時，政府仍處於一主導和「大力推動」的地位。誠如已故社會學家帕深思（T. Parsons）所指出，西方原初的工業化的動源來自私人之資本家，但二十世紀的工業化之後來者，則鮮少不以政治權威作為必要的動源^①。政治在當今發展中國家據有一樞紐性地位之事實，已無待深論。最可一提者，儘管馬克思低估了政治的重要性，在其理論中且未予政治一適當的位置，但在所有共產國家中，政治不但肥大，而且突出；政治不但非受決於經濟的「上層建築」，且真正居於一決定經濟的「下層建築」的地位，此在中共亦不例外。中共今日宣示推行四個現代化，而竟未及政治現代化。實則，政治現代化才是中共萬題之題。在中國大陸，如政治不現代化，則不止四個現代化難以發展，即使發展，其後果亦不必真大可欲。故談中國之現代化，不論在臺灣或大陸，政治現代化是一必須認真面對的大課題。

政治現代化的意義並沒有一個衆所共認的界定。社會科學學者常以政治體系的結構分化程度（Structural Differentiation）之高低，及政府能力（特別指規制能力、運籌及理性分配資源之能力）之大小來論斷。結構分化程度高者，政府能力大者，為較現代化的政治體系，反之，則為較傳統性的政治體系。準此以論，專制或極權之政治體系亦可劃入現代化政治體系之列^②。此種界定，自有其一定之意義，但我們則認為中國政治現代化必須包含民主

的價值，並以「民主化」爲政治現代化的主要指標。是的，這樣的界定是帶有「規範性」的價值觀的。但是，這樣的界定也並非純然是主觀的。誠然，我們可以在某個程度上同意下面的看法：即民主作爲一種政治形式，在推動、因應現代化的過程中，較之技術權威的政體（Technocratic Authoritarianism）似輸一籌^③。不過，大量的經驗現象顯示，在工業先進社會中，民主的政治較之非民主或反民主的政治，從積極方面說，更能維護和促進個人的尊嚴、自由及創造力；從消極方面說，則更是避免權力過分集中，防範暴君出現的武器^④。一點不假，在民主被過分意理化和理想化之際，它的真正功能反常常在誇張中變得曖昧了。從歷史的和比較的觀點看，民主的真正優點恐不在它比其他政治方式更能實現人間的天堂；它的真正優點毋寧在於它更有能力防止出現人間的地獄。中國在民主的追求上，需要的不是過多的浪漫情緒，而是平常的智慧和理性。

(二) 民主——中國政治之新傳統

中國數千年來，自成一文化，一社會，一政治體系。在人類歷史上，自有其偉大之地位，尅就政治體系言，中國的基本形態是君主專制，儒家的「民貴君輕」思想固然對專制產生了制約、紓解的作用，而傳統的行政結構也確有很大的開放性，但中國政治始終只在「治道」上旋轉^⑤。歷史上固不乏聖君賢相，但暴君污吏亦史不絕書，以是治亂循環，終難發展出「爲萬世開太平」之坦途，究其原因，實在「君主」（以君爲主）的架構上，權力之集中既「勢」有必（本）的格局，在制度上則落實在「君主」（以君爲主）的架構上，權力之集中既「勢」有必

然，政治之治亂則幾乎繫乎一人或少數人之爲善爲惡的或然性上。根本上說，中國傳統政治對權力與責任，權力與制衡等問題都無妥善的制度性的安排。歷代的思想家用力之着眼點不在如何防範權力的腐化與集中，而毋寧在如何使權力受道德的制約，而其中心旨趣則是期待、索求或培育政治上的道德人：即聖人、賢人或完人。依此一思想線索看，權力在政治的道德人手中，權力便不會被濫用或腐化。但是，政治上的聖賢或完人卻是太稀有的，是可遇而難求的，以是，政治社會勢不能措於久安之局。而有一點甚或更可擔慮的是，政治上的「道德人」也可能，並常常會使道德權力化或權力道德化。一手拿劍，一手執經，借「經」殺人，可以了無罪衍之感。古今中外，「經」可以不同，而政治之悲劇、慘劇則在「經劍合一」下，一幕又一幕的出現，迄今未已。現在的「經」更富於「科學主義」與「理想主義」的色彩，使所謂「真理」與「完善」結合，系統性的政治暴行可以完全不知爲非，可以完全理直氣壯，在這裏，我們可以了解爲什麼吉拉斯（M. Djlal）要肯定「不完美的社會」（The imperfect society），他說：「人必須有思想和理想，但他切不要以爲都可以完全實現。我們必須了解烏托邦主義的性質。一種烏托邦主義當其取得了權力時，便成爲一種教條，便極易於以其科學主義和理想主義來使人類受苦^⑤。」中國政治之出路所以在民主，實不因民主可以使人類達到一個「完美的社會」。嚴格地說，民主的字典裏就沒有「完美」這個詞彙，民主是一平平常常的政治形式，它不靠政治的聖賢或哲君，也不靠先驗的理想主義或烏托邦主義，而是靠平常人的平常心、平常智慧、平常理性。真正地說，民主是假定人，任何政治人，是不完美的。諾貝爾獎得主賽蒙（Herbert A. Simon）在一篇論民主的文章

中說，人類史上，不少例子，包括蘇聯的革命及中共的毛澤東式革命，都不止想為社會設計一個新的政府，而且想為社會創造新的人的品種，所謂「新人」，「社會主義人」的模鑄。很清楚的，這是水月鏡花，人類史上並沒有成功過，有之，就是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書裏的「新人」，一種完全依從社會或「老大哥」需要的人。以「完美的人」作為建構政府資料的想法，決不是民主的道路。賽蒙畫龍點睛地指出：

「美國憲法的創建者並不期求『新人』。他們沒有刻意設計一套社會制度，其有效性是要靠人的美好行為的，反之，只要人的行為像人的行為就是了。創建憲法諸公心目中的人是他們所見到的、接觸過的和認識的人；這些人是不完美的，充其量也是設計社會制度的很理想的資料。他們在試圖設計政府的憲法時，了解到這部憲法是要由這些不完美的人來運作的。」

民主不是理想主義或烏托邦主義的產物，民主制度建立在一個很實際，很平常的基礎上，它建立在平常人的喜好，平常人的道德與責任感上。人在民主制度下有人的高度，不高一點，但也不低一點。在人的廣泛覺醒下，民主顯然較其他的政治制度更能符合人的需要。事實上，自十八世紀以來，民主這個本意很平常的制度，經過種種歷史的考驗，在其他實驗過的制度的比較襯托下已彰顯了它的「理想性」。民主在今日已具有強大的規範力，甚至如劍橋的約翰·鄧(John Dunn)所說，已成為民族國家的「道德性的世界語」。即使非民主或反民主的獨裁者、極權政府，也不得不講「指導民主」、「社會主義民主」或「人民民主」等，來合法化其權力。誠然，民主之過份時髦，已造成世界政治市場上贗品充斥，真假

莫辨的局面，這也可說是二十世紀民主的特有現象與危機。

中國數千年來只措意於「行政」的合理化，但先聖前賢對於「政治」的形式幾乎是無所用心的。「民本」思想誠含有民主的成份，但「民本」與「民主」究有一間之隔，而此一間之隔則使中國的政治一直無法突破，一直無法通向民主，一直無法措中國政治於長久之安。中國之有民主思想是在十九世紀與西方接觸之後，而真正使民主轉為制度，進而改變中國政治形式的則是孫中山先生。中山先生創建的中華民國，為亞洲帶來了第一個民主共和國體，這在中國政治歷史上是劃時代的。中山先生是一位偉大的民族主義者，但他具有世界的眼光與智慧。這使他擁有闊大與開放的心靈，他當時清楚地知道中國的癥結之一是政治，也了解到民主是解決中國政治癥結的針藥，無疑這是他得自西方的靈感，也無疑這是他的巨眼卓識。作為中國的偉大民族主義者中山先生之倡舉民主，雖不必是「為往聖繼絕學」卻是「為萬世開太平」。這是中國政治的突破，也是中國政治現代化必由的歷史之正道。我們更可說，這是中國政治新傳統之開始，五四運動所揭櫫的「民主」與「科學」二個口號，正是這個政治新傳統的進一步發展。但是，百年以來，中國民主的成績如何呢？中國政治的新傳統又是否堅固地建立起來了呢？

二、社會主義與中國民主

(三)「極權民主」之歧出

中國追求民主的歷史雖然已經百年了，但講到真正民主的成績，如果以整個中國（包括大陸與臺灣）來檢視，則實在是差得很，而不是好得很。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中國人居住的大陸，在一九四九年之後，由於中共奉行馬列主義，建立共產黨政權，實已根本上走向非民主、反民主的道路。其實，馬列主義在理論上就否定了民主之價值，毛澤東思想導引的文化大革命更使大陸陷於「法西斯主義式專政」和「無政府主義式的自由」的亡天下之境。中共在繼續高舉馬列主義和毛思想之旗幟下，中國大陸的民主已處於一個極難突破與發展的困局。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天安門事件」及此後的「民主牆」等運動，固然聽到了籲求「民主」的強大聲音，「四五」顯然是對「五四」真切的回應，但在共產主義的意理與組織下，民主的前途是險峻而黯淡的，中山先生建立的政治新傳統在大陸已凍結了。

任何關心中國民主前途的人，決不能對馬列主義與毛思想掉以輕心。中共的政治是「意理政治」(Ideological Politics)，意理在中共的政治中所扮演的，用馬克斯派人士的術語，是不折不扣的「下層建築」的作用。而中共所採行的馬列主義，基本上是列寧主義和史太林主義，尤其是史太林主義，亦即是列寧、史太林所詮釋、所認可的馬克斯主義。這也決不是純屬偶然的，中共當時在經濟落後的中國發動「共產主義革命」，則很難不走列寧主義的路子，而中共要在經濟落後的大陸推行社會主義式的工業化，則當時史太林主義是現成的模式。誠然，如胡克(S. Hook)所說，共產主義在理論上不必不能與民主結合，民主是可以與任何經濟制度搭配的，共產主義之根本問題不在經濟，而在政治^①。史太林主義的特色即是政治的極權化，是權力的無限上綱（搞「個人崇拜」等），是一套靠恐怖來建立「一個

社會主義」的政治系統。白朗 (P. A. Baran) 是一位嚴肅的社會主義派經濟學者，他不以為社會主義這個「整個體系」要對史太林的暴行負責，但是他也毫不諱言指出，問題是出在「政治系統」上^④。共產主義的政治系統是極權性的，但是這個「左翼的極權主義」不像「右翼的極權主義」(法西斯主義)那樣令人一見起憎而生戒備之心，左翼的極權主義，相反的，卻有它的吸引力。因為它也講「自由」，也講「民主」，戴蒙 (J. L. Talmon) 稱之為「極權的民主」^⑤。「極權的民主」相信個人的自由與集體(國家、黨)的目標是完全可以相合的。「極權的民主」的信念是：爲了增進人類整體的進步，暴力是合理的。實際上，「極權的民主」雖然也講個人之利益與福利，但它卻可以否認個人在集體之外有獨立的存在，此所以共產黨自稱是「社會主義民主」或「人民民主」，但對個人，尤其是對圓顛方趾具體的個人，可以完全無視其權利與價值。「社會主義民主」或「人民民主」即是一「極權的民主」的樣本。「極權的民主」之立足點與推動力是盧梭的「全意志」，這是一個曖昧的先驗的概念。法國大革命時，在傑可賓黨專政之際，羅勃斯匹爾可以把一切反對他的人視為反革命、反「全意志」者，一一送到斷頭臺，而在道德上可以理直氣壯。共產黨的「社會主義民主」的立足點與推動力就是建立在「全意志」這樣的曖昧與先驗的概念上的；那就是馬克思的意理，亦即所謂馬克思的歷史發展律。在馬克思的歷史發展律中，「無產階級」是被賦予了像「全意志」一樣的代表性的。到了列寧、史太林手中，便由「無產階級」一變爲「共產黨」，又再變爲政治局，再變爲獨夫，此皆不過一轉手間事耳。在「極權的民主」中，邏輯地出現一「極權的倫理」，即凡是反對代表所謂「全意志」的則不止是錯誤、虛妄，而且是

道德上不可寬恕的；因為他（她）是與整個社會的目標衝突的，故而異己份子之不為國民公敵者鮮矣、難矣。

「社會主義民主」，不論蘇聯的、東歐的或中共的，都是「極權的民主」的版本。其實，它既不必是「社會主義」，更絕不是「民主」。誠然，如考茨基（J.H. Kautsky）所說，「社會主義」一詞與「民主」一樣，已氾濫無歸，已成爲一個歧義叢生的「符號」，在落後地區更變成了政治的「迷思」（Myth）^①。「社會主義民主」的曖昧性使它產生吸引力，使它產生「極權主義的誘惑」^②。

（四）中共反省之局限性

不過，共產主義（或蘇式的社會主義）的本質是史太林主義這一事實畢竟已越來越清楚了。如本文前面指出，民主之真正功能在防範獨裁暴君之出現，而「社會主義民主」卻剛剛助長了少數或一人的專斷與暴虐。這已不是理論的問題，而是歷史的經驗事實。蘇聯自一九一七年革命迄今已七十餘年，它在現代化其他層面非無成就，但在政治民主化上卻交了白卷。這就是史太林主義本質上的制限。中共建立政權之始，毛澤東即公開聲言要「一面倒」向蘇聯，採行的即是史太林主義，文化大革命時，毛澤東利用紅衛兵鬧「第二次」革命，講「造反有理」，講越亂越好，用體制外的暴力打擊體制內的權力（國家和黨機器），當時無數西方的知識份子以爲毛澤東思想開闢了一條走向真正社會主義的道路。他們在對史太林主義的希望幻滅後，轉而把希望放在毛澤東主義的文革上。那麼，文革的「毛式社會主義」究

竟又帶來什麼呢？自四人幫垮臺後，數不盡的冤案的暴露已一一揭破了這次革命的虛假性與罪惡性。

的確，文革可以用許多角度來剖析，但有一點是極重要的，文革所呈現的意理可說是「極權的民主」最浪漫的形式，盧梭的「全意志」換成了「羣衆意志」的曖昧性來展現，而實際上「羣衆的意志」只是「神的意志」，毛澤東已由人升高爲「神」。而文革的「大民主」落實之後，則成爲「法西斯主義專政」和「無政府主義的自由」。文革對中共無疑是一個慘痛的教訓，四人幫倒臺之後，中共亦確有痛定思痛的反省，在平反冤案之餘，亦措意於法制與秩序的重建，至於「四個現代化」政策的提出則更是一新的轉機。但是，在「四個現代化」中，卻沒有政治的現代化——民主化。顯然地，目前的中共雖然已努力在擺脫「毛式社會主義」的陰影，但卻又想維護毛澤東思想的成素，而自覺與不自覺地更傾向於史太林主義的路子。法國在學術界最有影響力的馬克思主義學者阿爾吐塞（Louis Althusser）曾指出，赫魯雪夫在一九五六年「秘密演說」中對史太林主義的批判的局限性，亦即只看到史太林背離了蘇聯的法制系統，而沒有深入批判蘇聯社會的基本結構及蘇聯共黨的組織文化^②。就這點來說，中共對毛澤東、毛澤東思想及中國共產黨組織文化的批判更是不徹底的，十分局限的。有大死始有大生，大陸在文革的滔天劫數之後正給中共一全面新生之機會，全國人民在共產主義「落實」了卅年之後，已極度厭倦與疏離，中共應了解這是改弦易轍，也是不能不對過去卅年作徹底批判與反省的歷史時刻。但是，中共的領導人卻把這樣的機會放過了，在宣佈四個現代化之後，卻緊接着強調四個堅持，在界定文化大革命是一文化浩劫之

後，卻又緊接着推崇始作俑者的毛澤東，高舉禍源所自的毛澤東思想了。四人幫之後，中共當然不是沒有一些好的新的轉變，但是在政治系統上，特別在民主與自由上卻沒有本質上的轉化，一度透顯的自發性的民主在缺少制度化的支持下不旋踵間就萎縮早凋了。民主在中國大陸的困局固然可以從中共特殊的歷史背景與社會性格去理解，但是，一個不可忽略且極有用的觀察方法，是把中共放到世界共產主義或號稱馬克思社會主義的社會的脈絡中去理解。遺憾得很，到現在為止，從共產理論「落實」後的衆多的經驗現象來看，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共產主義社會是稱得上真正民主的。這個巨大的經驗事實是偶然的嗎？面對這樣的經驗現象是不是靠說一句：「社會主義民主比資本主義民主更優越」就解決了問題呢？

(五) 民主與社會主義

在西方，有一些學者，一方面不滿於自由主義的民主實踐，一方面又失望於共產主義的實際成績。但在他們的觀念裏，民主的前途還必須從馬克思主義中去尋找。在這些學者的心目中，馬克思主義有真正的民主的傳統，並相信「真正的馬克思主義」(Authentic Marxism)必然是「民主的馬克思主義」。在這個思想模態中，匈牙利哲學家盧加煦(Georg Lukacs)被視為是一位「真正馬克思主義者」。無疑地，盧加煦是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的馬克思主義學者之一。在政治上，他強調「社會主義」與「民主」之結合的重要性。他用力最大之處在說明馬克思主義不可等同於史太林主義。盧加煦認為史太林主義不但阻礙了真正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而且是開了倒車。從而，他主張與史太林式的辯證唯物論必須有一個徹底的決裂。

顯然地，他不以為史太林主義的問題只是技術性的。在所謂「真正馬克思主義者」看來，只有認識到史太林主義是民主的和真正的馬克思傳統的一個「系統性的變態」這個事實後，才能開始建構民主的理論⁽³⁴⁾。

盧加煦等把馬克思主義與史太林主義分家誠然是重要的工作，在本質上，當代的共產主義國家都是或多或少以史太林主義為模型的。史太林主義之弊病已難藥救，唯一與史太林主義大異其趣的是文革的毛思想，但如前述，文革的毛思想較之史太林主義，論其對人類尊嚴與自由之殘害，恐有過之而無不及。而史太林主義與文革之毛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在革命「落實」後的二個最有代表性的實際表現，此二種實際呈現的經驗現象，從民主發展的角度看，則都是沒有出路的死巷子。的確，無數才學之士對馬克思主義皆曾有過迷執的戀情，但蘇俄與中共二大共產社會的實際經驗卻不能不激發人的理智的反省。決不是偶然的，法國一批被稱為「新哲學家」的年輕知識份子，過去都曾是迷戀過社會主義或毛思想的左派，在七十年代的後期，均從失望的深淵幡然醒悟。其中代表性的人物為 Pierre Hasner 指出「蘇聯和毛統治的中國已喪失了革命的社會之形象，並主要地被視為極權的官僚政治和軍事權力。」而 Bernard-Henri Levy 把社會主義描繪成「帶有一副人的面孔的野蠻主義」。他說：「在歷史上，社會主義首次成為世界的霸權，但弔詭的是，就在這個時刻，社會主義在世界各地都陷於危機中。」這批「新哲學家」固各有一番體驗與看法，但他們所帶給世人的同一訊息是：「馬克思主義已死，社會主義一直是極權的，中國也失敗了，美國並不那麼壞。」⁽³⁵⁾儘管這批法國「新哲學家」並不能就這樣判處馬克思主義的死刑，他們的言論仍充滿激情，